

专家视角

原创学位论文才是研究生教育的命脉

李军

“五唯”中的研究生苦境

“天下苦‘五唯’久矣!”这是一名985高校高级博士生不久前向笔者感叹的苦境——他面临再发表两篇CSSCI论文才能毕业的压力,希望能和笔者合作发表论文。他不是唯一受此折磨的博士生。笔者在国外指导的博士生毕业回国找工作,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用人单位无一例外地要求有论文发表,有的特别强调要求SSCI期刊(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论文。他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懵了:因为在研究生学习阶段,他们从来没有被要求过发表论文。对此,笔者只能给他们打气说:你的毕业论文受到答辩委员会的一致认可,很快就可以发好几篇期刊论文,就录用条件而言,应该绰绰有余了吧?坦率地讲,作为他们的导师,也是倍感压力。

“五唯”影响之深、之广、之大、之无所不在,以至于从2018年开始国家有关部门就连续发文要求各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系统清理。2020年12

研究生教育主要是学术训练而不是发表论文

需要首先厘清的是,这种规定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论文发表数量和期刊“级别”的制度要求的目的是什么?利益方又是谁?在“五唯”苦境下,研究生发表论文获益的常常并非研究生本人,而是培养单位追逐的学术GDP,并与大学排名等名利场紧密相连,直接利益方首先在培养单位。这是要求研究生发表论文的一个体制性内驱力。但是,这一做法严重违背了大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根本使命和目的,是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的短视行为。

显而易见,研究生教育的目的,不能狭隘肤浅地理解为发表论文。准确地说,研究生教育主要是一种学术训练,学会做研究和写论文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要求。所以,世界各国的研究生教育,不管什么学科、专业或者学习年限,都把围绕某个命题的研究及其研究成果的写作,作为基本的专业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最终成果和检阅,通常是原创论文的学位论文答辩。研究生完成这个基本的学术训练,达到基本要求,通过论文答辩,通常就可以被授予相应的学位。研究生学位的授予,证明毕业生已被培养机构认可在某个专业上和等级的学术能力,就可以被称为某某博士或者某某硕士,成为就职及其他社会场景的“牌照”甚至社会荣誉。



考生在结束研究生招生考试后等待离开考点。

卢启建摄/光明图片

注重原创论文才能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

所谓原创学位论文,通常的要求是必须首次发表,不可以包括任何已经发表过的内容(少许注明引用的部分例外),而论文答辩也被西方大学广泛认可为一种发表的形式。换句话说,原创学位论文不可以重复使用已发表论文作为其重要章节或内容。当然,学位论文引用作者已经发表的论文也没有问题,只要相关内容有明确的引用注明及符合相应的论文规范。如果引用已经发表的内容多于学校规范的,就有可能冲淡学位论文的原创性,会受到答辩

知识界的共识是,知识创新不在于论文发表在何处或用何种语言;论文发表的期刊也不存在等级,更不存在所谓的“顶级刊物”之说;甚至论文是否被高引,与知识创新其实也并不直接相关。纵使知识有实用价值的紧迫性与需求性,但谁能断言发表研究土壤的就高于研究物理的?抑或研究数学的就高于研究教育的?众所周知,创新的知识通常是难以被现有的知识体系所接受的。太多的历史已经证明,真正创新的知识,常常受到主流知识界的排挤甚至否定。结果就是,创新知识会在无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发表,甚至仅限三五同行的认可。

当前之所以强调学术期刊等“正统”发表渠道,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变化已经使知识摆脱了传统的生产方式。知识的大规模生产与各种社会分工、层级制度直接相连(如职场),需要依托某种有效的教育或知识定制制度(如文凭主义)。但是,现有学术和教育制度的特定作用不应被无限扩展或狭隘化。过度地延伸、窄化或消费这种制度分工,反而会事与愿违,窒息知识创新,造成知识自残或被知识的反向结果。“五唯”苦境,正是戕害知识的一个活生生证明。“五唯”苦境越久,论文造假、学术不端甚至学风腐败就会弥漫增长。长此以往,大学及其他研究生培养机构会逐渐变成知识的注水工厂,葬送大学的真正价值,导致知识乃至文明的停滞、混乱或倒退。

让研究生教育成为知识创新的先锋

由此可见,原创学位论文才是研究生教育应该牢牢把持和坚守的命脉。教育和人事主管部门、各高校及科研单位应当从政策上坚决、尽速、全面取消要求研究生发表论文,制度性地鼓励他们集中精力打好研究的基础。一篇出色的原创学位论文,可以让他们经受过知识创新的磨难,享受知识创新的乐趣,产生知识创新的正果,最终成为知识创新的先锋,以推动社会和人类的文明和进步。

(作者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育政策与领导学系主任、国际高等教育政策与领导学终身教授,美国比较与国际教育学会候任会长)

如何带文科研究生的“研究”起步

卢德平

所有研究生,从入学第一天开始,都希望通过导师,获得能力的发展。

顾名思义,“研究”是研究生的本质特征,“研”和“写”是文科研究生的主要任务。这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布置学术文献让硕士生、博士生看,这是起步。一段时间后,交来读书报告,就可以看出学生“研究”存在的问题。此后各个阶段,包括概念分析、问题聚焦、材料挖掘、价值提升、文本构造,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研究”问题,一直难以消除。导师若在指出问题而得不到解决,学生烦在知道了问题,但找不到解决的方法。问题的性质不同,但共性是明显的。

A类学生的情况是,阅读文献

后,能找到文章的创新点,生发一些思考,但思考不能聚焦。交上来的文章,往往天马行空,说了一大堆问题,就是看不出要研究哪个问题,也判断不出哪个问题重要,各种问题不能形成主次关系。换句话说,就是不能聚焦到一个核心问题上。这种情况属于“平行问题”误区。

B类学生的情况是,交上来的文章,往往是复述文献内容,类似文摘、译稿。虽然看到文献里的一些观点,但看不出文献背后的学术思路,想不出问题,停留于知识背景概述,无法进入研究。这种情况属于“远景扫描”误区。

C类学生的情况是,文献阅读只能停留于字面意思,找不到文章的创

新价值最大。理由是什么?教授要讲出让学生信服的道理。

第二要讲经典文献,帮助学生把具体文献背后的思想脉络、创新思路描绘出来,让学生从可见的文字看到背后看不见的学术精华。简单说,这个就是讲阅读的问题。阅读的目的是提炼和我们研究相关的内涵,解决文摘、译稿类“远景扫描”问题。

第三要讲文献的亮点定位。从文章的“提要”“引言”“结论”里定位出论文的创新亮点,帮助学生走进论文,走进学术,解决“学术阻隔”的问题。

以上我们仅仅谈了研究生指导第一阶段的问题,后续还有社会调查、数据分析、思路凝聚、结构整合、

这几天,最吸引学界眼球的事件,莫过于新版CSSCI目录要发布了。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在4月26日晚上公布了部分学科的C刊目录(南大核心期刊目录),引起学术人的无尽兴趣。好几个群里,好多学术公众号,都在讨论有哪些期刊列入了C刊,又有哪些期刊调出了目录,一时之间,紧张的气氛陡增。甚至还有提醒,以后论文投稿要谨慎,千万别选那些挣扎在C刊生死边缘的期刊。

笔者虽然经常写点文章,但是发表在C刊并不多。细细想来,这也许是受大学时哲学系教授们的风气熏陶。从读本科开始,教授们不仅不鼓励、指导学生们发表论文,也很少有老师与学生合署论文,反而是不少教授提醒要谨慎地发表,审慎地发表,大有“述而不作”的古风。沉浸其中,深受影响,以至于笔者发表在C刊上的第一篇论文,谈的是志愿服务。其后还写了不少志愿服务、新闻传播学的论文,却一直沒有尝试发表哲学论文。真是不敢,一怕言不尽意,言多必失,二怕说得不对,丢人得很,所以颇怀敬畏之心。毕竟,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大家时间都很宝贵,用不对或者不好的东西去影响别人,真是误人。

不过,不鼓励发表论文,并不代表不要重视写论文。在哲学系,老师们对课程论文、毕业论文的要求还是颇高,很多课程作业或考试中,都包含着论文写作和指导。对于每篇论文,自己也非常重视,常常专门花上两三周时间进行写作。只是写就写了,很少去考虑发表的事情,总觉得自己谈得再好,都只是一管窥之见,比起那些哲人巨著,他们经历时光的千锤百炼,早已讲尽了人生至理。也许更重要的,真不是怎么想、怎么说,而是怎么做,如何去行动。就像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是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行动和实践更能彰显人的生命力了。

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刮起了一股“言胜于行”的论文风。不仅写论文,发论文成了做学问的第一等要事,而且对论文数量和刊物级别的要求越来越高,老师、学生的竞争白热化,内幕得非常厉害,呈现出“四化”特点:一是论文写作的功利化,纯粹为了发表而写论文,而不是为了表达或者研究而写论文;二是论文写作的精致化,为了在激烈的论文竞争中获得匿名评审专家的青睐,论文写得越来越长、越来越深奥、也越来越模型化,就像一个精雕细琢的艺术品,雍容华贵却多多少少有点华而不实;三是学术圈层的庸俗化,核心期刊正在取代研究院系,越来越成为学术世界的核心节点,控制和影响着思想的输出和交流;四是论文写作的产业化,既有白色的产业链,通过学术训练培养人写文章的“屠龙术”,也有花钱代写代发的黑色产业链,让学术研究沾上越来越强的功利味,让我们逐渐迷失在这股迷雾之中。

近些年,就连颇有古风的母校,也开始追求起又多又好的论文来。在各种评价体系筛选出来的核心期刊、C刊之上,优中选优再选出一批顶级刊物作为A刊、B刊,对老师进行考核要求。我们的学术世界,似乎变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等级森严的论文世界。论文的数量和级别,作为重要的标志物,将学校体系之中的每个学生、老师都排列到一个秩序井然的学术结构之中。在这个结构里,老师不是老师,学生不是学生,而是一个个被论文数量和级别所表征和替代的“论文人”,根据论文的数量和级别,学生被分配奖学金和各种机会,老师们被排列成副教授、教授、二级教授,等等。在这个结构里,我们评价或者考核一个老师,不是听其言、观其行、知其心,而是看他的论文数量和级别。副教授等于2篇C刊,教授不等于5篇C刊,所有的岗位都被“明码标价”,教师的存在,丧失了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丰富而又饱满的“血肉”,而被简单化、量化为具体的数字。这

些数字,时时刻刻地提醒着、规训着老师,把他们变成论文而生活、而存在的“论文人”,把写发论文当作第一要务,至于有没有把学生装在心里,会不会真地上课,要不要正儿八经地做些研究等关系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事情,倒是被排到了次要的位置上。

尽管我们已经开始注意到“以论文数量和级别论英雄”的弊端,并且提出要破除“五唯”,但是只要政府或者教育主管部门,仍然用数字化的思维和做法,来评估和考核大学的办学业绩和学科成绩;只要各种媒体、自媒体在做各种新闻报道时还在有意无意凸显报道对象发表论文的数量和级别;只要高校在招聘、引进和考核教师时,明里或者暗里将论文的数量和级别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我们就不可阻挡地在数据主义的沼泽里越陷越深。人们对于数字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好感,数字化把简单、更直观因而更容易被把握,显得更为客观、公允因而更容易被人接受,大家似乎都无法抗拒数字化管理和精准计算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益处。

其实,用数字“框”人,将人量化为论文、稿件的数量和级别,并不是合适的事情。尤其在高校管理上,过于强调数字化管理,将数字化思维和精准计算用在人的评价和考核之中,似乎很难带来好的结果。高考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如果还只是以分数论英雄,以分选人,最终导向的就是白热化却低效率的学业竞争,孩子们为了提高1分,将潜在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都耗费在重复的刷题和枯燥的应试之中。如今,类似的数字化竞争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围绕论文的数量和级别的竞争,只是数据主义无所不在,意欲掌控一切的一个表象而已。

人的存在,是多维度、多样化的,也是不可计算的。每个人都拥有着丰富的灵魂,有着尊严有别于他人、区别于物的尊严和个性。尽管数字化,包括考试分数作为个体智商的表征,论文数量和级别作为个体学术能力的表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状况,但是将其压倒性或主导性地作为唯一或者少数的指标,用来衡量和评价一个人,就会产生以偏概全、以点代面的风险,将我们引向唯数据是从、唯C刊是瞻的恶性竞争。写发论文是学者履行职业的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学术交流的有益途径。写就写吧,发就发吧,千万别被数字化管理的做法裹挟,刻意去追求论文的级别和数量,特别在意C刊或核心期刊的动向,把自己写成了“论文人”。

写到这里,想起了一位教师出身的企业家朋友曾经劝慰笔者的话:“人这一生,不能活成了证明题,孜孜以求地去向他人、向社会证明自己,而要活成一篇散文,在自由的追求中去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形散而神不散。”也许,这句话构成了对把学者们异化成“论文人”的学术数字化最有力的反省和批判。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

千万别做「论文人」

李凌



扫描二维码,参与话题讨论。